

■ 齐民要术

“五月棉花秀，八月棉花干。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”棉花，在传入山东后，也有了齐鲁气象，在温暖百姓的同时，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。

山东棉花：衣被苍生齐鲁暖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如今的高密西北乡，胶济线上的蔡家庄车站，已不似一百年前的繁华。和谐号高铁呼啸而过后，带起了铁道两旁的旧尘。

当年，蔡家庄有占地200亩的轧花厂。人来人往，众人推着小车，赶着驴车，上面载着十里八乡土地中采来的棉花。

“五月棉花秀，八月棉花干。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”棉花在传入山东后，也有了齐鲁气象，在温暖百姓的同时，也映衬着时代的步伐。

八月八来摘棉花

“高密东北乡种红高粱，西北乡种白棉花。”年过七旬的蔡家庄村蔡善福老人介绍说。

“听长辈说，那时候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4台大轧花机，山东有4台，在德州放了两台，俺们蔡家庄站轧花厂有两台。一白天一黑夜，轧花就跟着大雨似的，20万斤就出来了。”蔡善福说。

“当时设备很先进。有一次，坏了一股橡胶三角带，拿到上海化验，仿照着人家生产，但拿回来挂上，转转就断了。那进口的橡胶三角带，挂上后是绷紧的。”蔡善福介绍，当时的轧花厂是上海一位叫“华新”的资本家投资的。

历史，总在模模糊糊间被遗忘。蔡善福所说的“华新”，其实是一百多年前成立的青岛华新纱厂。记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《青岛华新纱厂特刊》中关于华新建厂的记载，文中称民族实业家周学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，“见居民面多菜色，衣不蔽体，怒焉悯之”。于是，他就召集亲友，决定创办“华新实业公司”，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。

“华新”在口碑相传中，成为具象的，而记忆也有准确时。“俺村里有1800多亩地，一半半的地种棉花。”蔡善福记得年轻时，棉花品种有徐州818，“小孩害渴，吃它的棉花桃子，桃子大，发甜”。还有一种高密933，“熟得快，采棉时间集中”。

在莫言的大哥管谟贤的记忆中，《红高粱》拍成电影后，张艺谋还让莫言写一个大场面的故事脚本，由他来拍。莫言应约写了中篇小说《白棉花》。莫言觉得，成百上千亩的棉花开了，像天上的白云，一望无际；成队的拖拉机，板车拉着棉花来卖，收购站的棉花堆成了山，这就是大场面。

“小说《白棉花》和《红高粱》不一样，是很写实的。高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，国家就大力推广种“爱国棉”，提出“要发家，种棉花”的口号。用新品种“斯字棉”代替了本地棉花，产量高，品质又好。农民们响应政府号召，大种其棉。”管谟贤说。

在1958年出版的，由当时农业部计划局编辑的《农业经济区划资料汇编》中，记载胶淮河谷低洼区，位于淮河北大沽河之间……属于一般粮食产区，唯高密棉花种植较多，是本省东部棉花集中产区。

那时，高密成了全国重点产棉县。莫言在家当农民时，选棉种、育苗苗、种棉花、锄棉花、脱裤子（摘掉下部老叶）、打杈子、打农药、拾棉花、拔棉柴，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棉田里转。尤其是打农药，那时用的全是“1050”“1605”一类的剧毒农药。开始，人们还戴口罩，戴手套，后来口罩手套都不戴了，人也没中毒，似乎也有人有了抗药性。背着喷雾器，一连几天钻进棉田里，又累又有毒，莫言是深有体会的。

到了1973年，由于叔叔在县第五棉油厂当主管会计，莫言有幸进厂当临时工。开始是在车间里抬大包，后来又学了检验级别，过磅，还参加大

批判，出黑板报，深得领导好评，直至1976年1月参军才离开。

在《白棉花》中，莫言引述“摘棉歌”，歌词如下：“八月里来八月八，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；眼前一片白花，左右开弓大把抓，抓，抓，抓……”

棉花开遍山东各地。在聊城地区，有“拾棉花”的民歌：“年年有个八月八，姊妹二人拾棉花；大姐就把竹篮挎，二姐就把包袱扎。”

纺棉花的民歌，在山东更是数不胜数。鲁南地区有民歌唱道：“小小纺车八根杈，转遭都是稻草绳；要问棉花怎么纺，左手拉线右手拧。春天纺棉花天气暖，家家户户来纺棉，快快织来快快纺，织出布来做衣裳。”

“梧桐木华”即棉花

高密的棉花种植，只是山东棉花的一个缩影。古今相似，棉花浑身是宝，不仅是织布的原材，还被人们用做御寒衣、被、褥的棉絮，棉花籽可以压油燃灯，其滓可以作肥料，棉秸秆可以烧火做饭。

棉布比丝绸经久耐穿，比麻布细密温暖，不仅适合北方人穿，即使在天气炎热的南方，冬季人们也穿棉布衣服。棉制品又因物美价廉，地位远远超过了丝、麻，因此，棉花在古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。

棉花似白云，从国外飘入中国。最初传入边疆地区，而后传入中原。棉花传入我国，大约有两种不同途径。

其一，从南到北传入。具体说来，有从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我国海南岛及两广地区的亚洲棉。战国时成书的《尚书·禹贡》中有“岛夷卉服，厥篚织贝”之记载，古今不少学者认为“卉服”即指棉布所制之衣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载：“武帝末，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。”“珠崖即今海南岛东北部，广幅布就是棉布，当无疑问。由此可知，秦汉时海南岛已植棉，产棉布了。”

两广地区也较早地种植棉花。公元五世纪的《南越志》中记载：“桂州出古时藤，结实如鹤毛，核如珠珀，治出其核约如丝绵，染为斑布。”桂州在今广西。

由南向北还有第二条路径，即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。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记载牢夷“有梧桐木华，绩以为布，幅广五尺”。晋西时的临淄人左思在《蜀都赋》中说“布有楮华”，李善注引张揖曰：“楮华者，树名楮，其花柔，可绩为布也，出永昌。”这里的哀牢、永昌，均指今滇南地区，而“梧桐木华”“楮华”即棉花。

其二，由西向东传入。非洲棉经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，再到河西走廊。《梁书·西北诸戎传》：“高昌国，多草木，草实如茧，茧中丝如细纤，名曰‘白叠子’，国人多取织以为布。布甚柔软，交市用焉。”高昌即今天盛产棉花的吐鲁番。

由于新疆地区干燥的自然环境，使得不少古代的棉纺织品遗物保存下来。特别是在吐鲁番的晋代墓葬中发现了已炭化的棉籽，经鉴定是非洲棉。非洲棉又名草棉，质量不高，在我国已早被淘汰。

木棉花发齐鲁地

棉花虽早已在中国扎根，但传入中原，仍有漫长历程。在目前所见史料中，棉花由边疆传入中原的具体过程尚不清晰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局势不稳，各地交流较少。而到了隋唐以后，中原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加之宋代经济重心南移，长江流域与两广、云贵地区经济来往密



蔡家庄轧花厂验棉花的场景

切，棉花在唐宋时期已不断向中原地区移植。

唐朝时，棉花依然是奇珍异品，棉织品为上层人士享用。唐朝晚期，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《苏莱曼东游记》中，记叙公元851年，在今天北京地区见到的棉花是在花园之中作为“花”来观赏的。有不少诗人，为棉花题诗作赋，如白居易的“吴绵细软挂布密，柔如狐腋白似云”，王维的“撞布作衣裳”，杜甫的“光明白叠布”，张籍的“木棉花发锦江西”等诗句。而在文学作品中，“白叠布”“木棉花”都还是珍贵之物。

到了宋朝，棉花制成的衣服已在日常生活中较多出现，开始逐渐挑战丝绸的霸主地位。由于棉花“比之桑蚕，无采养之劳，有必收之效；埽之桑兰，免绩缉之工，得御寒之益，可谓不麻而布，不蚕而絮，……此最省便”，因而得到了比桑麻更快的发展。

宋朝时，南方种植棉花的区域有进一步的发展，不过还仅限于长江以南地区。目前中原地区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纺织品遗物，是在1966年浙江兰溪一座南宋古墓中发现的一条棉线毯。

到明代时，棉花开始感染齐鲁气息。朱元璋模仿元代统治者征收棉花、棉布的政策，出版植棉技术书籍，引导民众种植棉花。他三令五申要人们种植一定数量的棉花，以保证国需民用。1366年，全国尚未统一他就下令：“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，栽桑、木棉各半亩，十亩以上倍之。不种桑，罚每年出绢一匹，不种麻及木棉，罚出麻布、棉布各一匹。”

山东棉花大发展，大约自明初起。明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额定实物租税的税率：“麻亩征税八两，木棉亩征四两。”洪武二十七年，明太祖命令负责机关：广逾民间，如有隙地，种植桑枣，益以木棉，并授以种法和蠲替税，步终具数以闻。并允许农民以棉花或棉布代替粮食完纳课税，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。

山东土地，与棉花有缘，一相逢便硕果累累。洪武四年，朝廷就用“山东棉布万匹”买外马。洪武九年两次“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”。《太祖实录》载，洪武二十九年庚子条记有

“北京都司布六十万，棉花三十四万斤。辽东都司布五十五万匹，棉花二十万斤，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”。这说明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都发展到相当程度。

从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中所记载的“棉布寸土皆有”“织机十室必有”，可知当时植棉和棉纺织已遍布全国。而随着城市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，需要大量原料，更刺激了农村种棉花的积极性。明朝时，兖州“地多木棉……转贩四方，其利颇熾”。

锄花要趁黄梅信

棉花的扩散，让古代农学家开辟了新天地。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“北花出畿辅，山东”，山东在明代后期已经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棉区之一。徐光启生长在棉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一带，家世业棉，对棉花种植情况较为熟悉，他对当时的棉花种植经验用四字诀概括：“精拣核，早下种，深耕短耨，稀科肥壅”。

而另外一位记录下棉花种植的农学家，则是山东人——王象晋。他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自号明农隐士，赐闲老人。他是明万历三十二年（公元1604年）进士，授中书舍人，官至浙江右布政使。

晚年致仕还乡后，王象晋在故里新城著书立说，并亲自教导子孙课业。他对种植花卉、果树、蔬菜等作物情有独钟，居官之时亦不忘农耕之本，经常深入农田现场细心观察体验。他重视对粮食作物、果树种植的研究和记载，常常对某种作物引入栽培、反复试种。

经过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，王象晋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，又从古代农书中汲取了不少宝贵资料，用了十余年的时间 and 心血，编撰了一部二十八卷四十余万字的农学巨著《群芳谱》。它集十七世纪初以前的古代农学之大成，内容广泛，论述周详。书中按照天、谷、蔬、果、茶、药、桑麻、药、木、岁、花、卉、鹤鱼等十二个谱分类，对每一种植物都详叙形态特征、栽培、利用、典故和

■ 齐鲁名士

北宋靖康元年，金人攻破宋朝都城东京，金主下诏废徽、钦二宗为庶人，另立勾结金人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皇帝，国号楚。

马伸极力反对，张邦昌被迫退位，立康王赵构为皇帝，才使宋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。

马伸：挽救了宋王朝的忠臣

□ 王文霞

北宋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十一月，金人军队攻破宋朝都城东京（今开封市），第二年正月，金军先后把宋康宗宋徽宗，宋钦宗拘禁在金营，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徽、钦二宗为庶人。另立勾结金人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皇帝，国号楚。宋王朝至此灭亡。在东平人马伸的极力反对下，张邦昌被迫退位，并答应立康王赵构为皇帝，才使宋王朝又延续了150多年。马伸因此名留青史，累代朝野为之赞颂。

为人正直，辞官求学

马伸，于宋神宗元丰元年（公元1078年）生于东平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，祖上家境殷实，且耕读传家。其父马衷，于元丰八年即马伸8岁时高中进士，巧的是被朝廷封在家乡做官，任郓州（今山东东平）宿城尉。其父在家乡为官，这为马伸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加上马伸自幼聪明伶俐，酷爱读书，宋哲宗绍圣四年（公元1097年）不到20岁的马伸高中进士，此后任成都郫县丞。20岁担任县丞可谓春风得意，大器早成，但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忠君爱民，上为朝廷分忧，下为百姓着想，政绩卓著，深受百姓爱戴。《宋史·马伸传》载：成都郫县丞，守委受成都租。前受输者率以食色假好谄而败，伸请绝宿弊。民争先输，至沿途假寐以达旦，常平使者孙侯早行，怪问之，皆应曰：“今年马县丞受纳，不病我矣。”侯荐于朝。

《郫县志》载：“县令，马伸，东平人，先是监税者率以食色玩好谄而败，及伸为县丞，痛革其弊，民争输纳，上官荐之，召为殿侍御史。”宋徽宗

崇宁二年（公元1103年），马伸26岁时又被朝廷任命为西京（河南洛阳）法曹（古代司法机关或司法官员的称谓）。

马伸任职洛阳后，因仰慕当时宋代大儒程颐，便想归依程门，潜心研究学问。程颐，字正叔，河南洛阳人，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。程颐24岁时曾在京师（今河南开封）授徒讲学。宋神宗熙宁五年偕兄程颢于嵩阳讲学。元丰元年知扶沟县，“设庠序，聚邑人子以教之”。元丰五年，文彦博将其鸣皋镇（今河南洛阳伊川县境）之庄园赠给程氏，乃自建伊皋书院，程颐讲学其中几乎达20年。程颐一样，程颐也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，“圣人之心，只欲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圣人以天地之心，“一切涵容载载，但处之有道”，主张教育必须培养圣人作为志节。

程颐的学说当时遭到了一些人的诋毁，他怕连累了为官的马伸，对马伸辞官求学好心劝阻。《宋史·马伸传》载：崇宁初，范致虚攻程颐为邪说，下河南府尽逐学徒。伸往西京法曹，欲依程门以学，因张绎求见，十反愈恭，颀固辞之。伸欲休官而来，颐曰：“时论方异，恐贻子累，子能弃官，则官不必弃也。”伸曰：“使伸得闻道，死何憾，况未必死乎？”颐叹其有志，进之。自是暇虽风雨必日一造，忌唱者飞语中伤之，弗闻，卒受《中庸》以归。这也就是说：从那时开始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马伸每天都到程颐处去一次，有人对他恶语中伤，他全然不顾，终于听完了程颐对《中庸》的讲解。

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八十八》载：崇宁二年四月，戊寅，诏：“追夺王珪谥；王仲端、王仲雍并放罢，遣表恩例减半。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，除名，其人山所著书，令本路监司觉察。”范致虚又言：“颐以邪说谤行，惑乱众听，而尹焞、张绎为羽翼，乞下河南尽逐学徒。”颐于是迁居龙门之

南，止四方学者。《河洛大儒》描述：崇宁二年四月三十日，程颐完成《春秋传序》。第三天下午，程颐正在家中同尹焞谈论他写的《春秋传序》，张绎引马伸走了进来。马伸说：“我前日到朝中有公事，听说皇上在蔡京的谏言下要大力恢复熙宁新法，对元佑党人要大加迫害，昨天西京已接到皇上下诏，要追毁先生出身以来文字，除名，把您入山后所写的著作，令本路监司觉察。我看到后，特前来报与先生，以便先生有所准备。”

这充分反映出马伸为人正直，为追求真理、追求学问，不畏权贵，更不善投机钻营，这也是他在当时腐败的宋朝时期，长期得不到重用的主要原因。在任郓州县丞后，又被调任奉符丞兼令事，再后来任泰安丞。从20岁做县丞，在此后的29年中，没有得到任何迁升。到了公元1126年，宋钦宗继位后，也就是靖康元年，马伸任监察御史，那年他已经49岁了。

义正词严，挽救王朝

马伸任监察御史仅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金人就攻破了宋朝京都，第二年二月六日掳走了徽、钦二帝，立金人的原宋宰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。张邦昌，字子能，永静军东光（今河北东光）人。徽宗和钦宗时期，历任尚书右丞、左丞、礼部侍郎、少宰、太宰兼门下侍郎。靖康元年，金兵攻汴京今河南开封，他力主议和，为河北路制使，与康王赵构赴金作人质，以求割地赔款议和。靖康二年金兵陷汴京，掳去徽、钦二帝，金封他为王，建国号楚，统治黄河以南地区。

对此，文武百官没有人站出来反对，只有东平人马伸坚决反对，致书张邦昌，要求其退位。立康王赵构为皇帝，他在给张邦昌的信中，这样写道：

艺文，这是其他农书所不及的，在我国农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《群芳谱》于明崇祯二年（公元1629年）出版，书中“棉谱”一章主要分选种、下种、耘苗、打心、拾花等段落。王象晋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了山东的棉花栽培技术。

选种时，王象晋强调时机的重要性。他引用老农“棉种必冬月碾取，经日晒燥”的说法，并指出“浸用雪水能耐旱，鲤鱼汁浸过不蛀”。

棉花下种时，不宜过早，怕春霜伤苗，但也不能太晚，怕秋霜伤桃。王象晋分析，大约在清明谷雨间。“种法有三：漫撒者，用种更难栽；耩耩者，易锄而用种亦多；犍六种者，用种颇少，但多费人工。”他如是写到。

而棉花出苗后，如何耘苗也是极重要的。王象晋说，耨者一去草秽，二令浮土附苗根，则根入地深，三令土虚浮根，苗得远行。“功须极细密，锄必七遍以上，又当在夏至前。谚曰：锄花要趁黄梅信，锄头落地长三寸。大抵苗宜稀，锄宜密，此要诀也”。

至于棉花打心，应在苗高七八寸，打去冲天心。“大约打心当在伏中，三伏各打一次。不宜雨暗，恐壅灌而多空条。最宜清明，庶旺相而生旁枝。如有未长大者，又当随时打去，不必例拘”。

到拾花时，王象晋记载：“花既结桃，待桃开级露为熟，旋旋旋摘，堆放。”

种棉乃兴利急务

清朝康熙以后，耕地面积逐渐超过明代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进一步扩大。原来经济作物很少的地方，也普遍种植棉花。清朝时，山东的棉织业也日益发达。

鸦片战争后，在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，输入中国的外国机器棉制品逐年增多，传统手工棉纺织业遭到洋纱、洋布的巨大冲击。

1903年，清政府设立商部，力图振兴农业，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改良。棉花是清末种植业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，倡导棉业改良即成为商部的主要措施。

1904年，商部通飭各出使大臣转飭商务随员，“详细调查该国棉花种类，种植成法外，还咨请各省将全境棉业详细调查，主要调查所属地方，土性宜棉者若干处，产棉之地若干亩，岁收平均之数，亩得若干量，以何属为最多，以何区为最良，以何种为最佳，以及历年收歉分数，衰旺原由等，分别汇报到部”。

同年4月，商部从美国大批输入美棉种子，分发山东、直隶等省试种，大大促进美棉推广与传播。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山东道员余恩治由美国圣鲁易斯城购进美棉种子六百公斤，第二年东昌府、高唐、茌平等县试种，结果良好，洋棉结实，较本地棉加倍还多。

据1906年十月《时报》报道，东昌府知府魏梅村于棉花收成后送交验美棉高大三倍于本地棉，每亩种本地棉约7000棵，美棉至多不过1000棵；本地棉结桃多则20余，美棉可结70—80桃；以当年成本计，本地棉约收35—40公斤，美棉可收100—200公斤不等；所种美棉质量上乘，宜于纺织，此次试种较为成功。由此可见，图强复兴的努力已初见成效。

1908年，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光绪帝指示农工商部，要详细调查各国棉花种类、种植成法，分别采择，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，颁行各省，由该省督抚等认真提倡。光绪帝言辞恳切地下谕道：“……此乃兴利急务，勿得视为具文。致负朝廷振兴农务惠民生之至意。”

新品种引进后，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。在山东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，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，如胶济铁路途经的高密、小清河沿岸的邹平等地。

谁知纯棉虽然红，衣被苍生别有利。农人种棉甚为辛苦，而如果人衣一旦被沾到棉花栽培和选择，它仍然会改变现在的植株形态和生长习性，逐步适应干旱的山谷旷野生活，并恢复到它的原始野生形态。纵观山东棉花种植的历史，也印证着这一点，当人们把棉花当回事儿时，棉花才吐露出温暖的白绒。

大的。如果没有马伸联合其他官员反对张邦昌的傀儡政权，张邦昌是不会自动让出皇位的，时间长了，他的政权就有可能巩固下去，这样的话，就不会有南宋王朝的存在了，中国历史将被改写。马伸被《宋史》列入《忠义传》是当之无愧的。

受冤被贬，抱憾而死

赵构在应天府称帝，建立南宋后，马伸跪上呈上奏章以都城失陷不能救援，徽、钦二帝被掳走不能以节义而死，请求就地放逐削职。皇帝知道他有忠义之心效力于国家，不但没削其职，反而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，抚谕荆湘、广南，以诛杀张邦昌及其党徒王时雍等人。马伸在所经过的州县，询问考察官吏贤能与否以及百姓的利害病痛，以便依次排列向朝廷上奏。马伸从荆湖、广南返回后，入朝上奏黄潜善、汪伯彦不法行为共十七事，拟写的奏章已经备办，却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。马伸又进疏说：“黄潜善、汪伯彦另外建立亲军一千人，请求供给居住的地方。比仇鸾优厚，他们收买军心，施予私人恩惠，陛下克制忍耐不肯贬逐他们，极端困苦的民众已感到绝望，二帝回朝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呢？每每想到这些，伸就感到生不如死，岁月如流，时机容易失去，希望陛下迅速解除黄潜善、汪伯彦的权力，另外选择贤能，共同图谋国家大事，奏疏入内，留在朝中。”

马伸时时为南宋江山着想，多次向赵构进谏，而赵构听信谗言，认为马伸所奏不实，对马伸连续两次贬官。靖康三年九月又把马伸贬为濮州监酒税。马伸带上行李神情自若地前去赴任，不幸的是病死在上任的途中。天下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，都认为了马伸冤枉，对他的死感到痛心。

马伸死后第二年，宋高宗下诏：“不问其死，朝廷召之，以示不以前贵为罪之地。”赠马伸直龙图阁。马伸死后第三年，其子孙为躲避秦桧迫害，迁往福建。在马伸去世七年后，高宗仍念其忠义，赠殿中侍御史马伸直谏议大夫。马伸死后25年，曾受学于马伸的昭武人何克，上奏朝廷，为马伸伸冤，诉状送到尚书省，秦桧大怒，把何克投入狱中，直到两年后秦桧死了，何克才官复原职。明嘉靖二十五年（公元1546年），马伸死后418年，东平为其建马公祠。清光绪三年，又在东平州城北门内书院旧址改建。这也足以看出，马伸死后，一直受到朝廷上下的尊敬与推崇。